

让·弗·利奥塔

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

秦喜清/著

Jean-Francois Lyotard

跨世纪西方当代思想家画传



跨世纪西方当代思想家画传

**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
让-弗·利奥塔**

秦喜清/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让·弗·利奥塔 / 秦喜清著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8

ISBN 7-5039-2222-2

I . 让 ... II . 秦 ... III . ①利奥塔, J.F. - 人物研究 ②利奥塔, J.

F.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5817 号

让·弗·利奥塔

著 者 秦喜清

责任编辑 苗 洪

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

版式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whyse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20

印 张 14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222-2/G·326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秦喜清，1963年生。先后就读于南开大学外语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获文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曾发表译著多篇。

让-弗·利奥塔

1924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市郊的凡尔赛，后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福柯等法国著名思想家同校学习。1950年，他通过考试，获得哲学教师资格。1952年赴阿尔及利亚的康斯坦丁教授中学课程。1954年重返巴黎后，积极参与工人运动，成为法国左翼组织“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的成员。1964年该组织分裂，利奥塔逐渐退出政治活动，转向学术研究。1971年获博士学位。1979年出版《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影响极为广泛，被视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思想家。后一直在巴黎大学任教。

责任编辑：苗 洪

装帧设计：苗 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言

世纪反思——后现代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 · · · 1

一、背景描述与分析 · · · · 2

二、多声部的后现代主义 · · · · 13

三、利奥塔——后现代主义个案 · · · · 21

第一章 激情的回落 · · · · 32

一、法国知识分子的“左派”传统 · · · · 34

二、“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 · · · · 40

三、怀疑与转向 · · · · 46

第二章 最初的反叛 · · · · 58

一、《话语、形象》 · · · · 60

二、欲望哲学 VS. 符号学 · · · · 68

三、“利比多经济学”——一种理论另类 · · · · 82

第三章 现代性批判 · · · · 98
一、转向后现代 · · · · 100
二、元叙事危机 · · · · 110
三、总体性解体 · · · · 119
第四章 审慎的知识分子 · · · · 132
一、什么是主流知识分子理论? · · · · 134
二、《知识分子的坟墓》· · · · 145
三、走出权力壁垒之后 · · · · 155
第五章 先锋派的理论证言 · · · · 166
一、关于(后)现代艺术 · · · · 168
二、不可表现性与绝对先锋 · · · · 184
三、时间性与突破共识 · · · · 203
结束语
崇高美学——另类政治学 · · · · 221
附录
回忆马克思主义：为皮埃尔·苏伊里而作 · · · · 238

序言

世纪反思 ——后现代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一再被用来描述某种思想范式、时尚风格或学术方法。被约集于这一名称之下的现象斑驳陆离，对其名称的溯源与界定也是五花八门。已经跨入新世纪的人们依然会记得理论界因它而起的喧腾，同时也难免再次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在时间的无限延展、推移之中，后现代主义将成为一段令人追忆的历史呢，还是仍然饱含理论潜力，能够开启新的理论空间？现在对后现代主义“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但必要的回顾与梳理却可以深化我们对它的认识，这正是本书的缘起。

一、背景描述与分析

“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出现较早。^[1]1870年，英国画家约翰·沃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提出“后现代绘画”(postmodern painting)，用来指一种比法国印象派更现代、更先锋的绘画创作。1917年，鲁道夫·潘维兹(Rudolf Pannwitz)在《欧洲文化的危机》中论述了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和价值体系的崩溃，他提出培养“后现代人”(postmodern men)，以体现尚武主义、民族主义的精英价值观。1934年，费德里克·德·欧里斯编选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集》中使用“后现代”一词。8年之后，杜德莱·费兹在编选《当代拉丁美洲诗选》时再次使用该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提出了“后现代时代”(postmodern age)这个概念。汤恩比认为西方历史自黑暗时代(675－1075)之后又经历了三个时代，即中期(1075－1475)、现代(1475－1875)以及后现代时代(1875年以后)。其中，现代时期以社会稳定、理性和进步为特征，后现代时代则充满动荡、革命和战争。这种历史分期表达了汤恩比的历史观，他认为文明的兴衰循环往复，后现代时代意味着文明走向衰落。至此，后现代一词只是作为一个喻指某种特征的形容词偶尔见诸笔端。

到20世纪50年代，有感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西方社会学者逐渐频繁使用后现代一词，以概括新的社会历史现实。在文化历史、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后现代俨然出落成一个时新概念。例如，在《大众文化》(1957)一书的序言中，文化历史学家伯纳德·罗森伯格(Bernard Rosenberg)谈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他说：“后现代(postmodern)人首

次被商品包围，他本身也变成全部文化进程中一个可交换部分。”^[2]同年，经济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明天的里程碑：新的后—现代世界报告》中描绘了后现代世界景象，他认为，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教育与知识的普及，后现代世界将消除贫困和愚昧，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将导致民族国家衰落，意识形态终结。与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相反，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则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新发展持否定态度，他把后现代时期比作是欧洲的“黑暗时代”，他在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想像》一书表达了上述观点。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经历了革命性激变。从青年学生造反到妇女解放运动，从波普艺术的滥觞到爵士乐的流行，在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后，西方文化也随之发生形态改变，对此，更多学者和评论家启用后现代一词进行概括和评价。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和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为代表的肯定派盛赞60年代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西方文化，认为这种新兴的“后—”(post-)文化是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压迫的反抗。而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把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看作是现代主义危机的继续。还有一些学者，如欧文·豪(Irving Howe)、哈利·列文(Harry Levin)，对后现代文化也持一种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后现代文化标志着启蒙理性主义的衰落，是一种反理智主义，是现代主义理想的破灭。

尽管后现代一词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开始被使用，斯蒂文·康纳认为，直到7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概念才开始定型，他认为，先是各学科内部越来越明确地肯定后现代主义的



青春的激情、革命的旗帜、风起云涌的“60年代”。

后现代话语开始于五、六十年代，定型于70年代，这期间西方社会疗治战争创伤，全面恢复发展，经济呈蓬勃之势，进入了战后的黄金时期。哈桑说，后现代主义症候着西方社会的变化，^[4]指的就是这一时期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迁。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开始艰苦的经济重建，到5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已发生重大改观。约翰·阿达(John Ardagh)曾这样叙述法国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50年代早期至70年代中期“法国经历了令人眩目的更新。一个萧条的经济变为世界上最有活力、最成功的经济之一，物质的现代化以激动人心的步伐发展着，一个曾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成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经济繁荣青云直上，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并突出了根深蒂固的法国旧习与新方式间的一些奇异的冲突……”^[5]西方主要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更新”过程：城市化和工业化齐头并进，并

存在，各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印证和支持，后来“随着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法文本(1979)和英译本(1984)的问世，上述不同学科的诊断得到学科间的共同确证，似乎再也没有怀疑存在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余地”。^[3]

在文化冲突中确立新的生活方式。

在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下，这三个十年又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其中世事动荡、“革命”频仍、文化反叛的60年代尤为重要。1998年，西方史学家阿瑟·马维克(Arthur Marwick)出版了巨著《60年代：英法美意的文化革命1958—1974》，全面叙述西方主要国家在60年代的文化巨变。马维克认为，20世纪60年代具有极独特的意义，“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本

60年代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向白人世界发出抗议。





6

世纪(指20世纪)后来的社会和文化发展”。^[6]为了凸显60年代的文化特征，他将50年代与60年代加以比照，认为它们的文化精神截然不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50年代，社会等级严格，种族歧视普遍，服饰和语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反叛权威，打破常规和跨越界限的年代。

言循规蹈距，家庭伦理观念保守传统，大众文化产品乏味呆板；相反，60年代则是一个反叛权威、打破常规和跨越界限的时代，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向白人权威和种族间的不平等提出挑战；爵士乐、流行音乐、甲壳虫乐队与高雅的古典音乐分庭抗礼；性解放、新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动摇着男性至上的父权体制。50年代的平稳与60年代的激烈构成鲜明对比。

从整体上看，50年代的西方社会的确带有平稳化和统一化的倾向，其特征是经济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知识技术阶层被吸纳、整合到经济体系当中，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中产阶级日益庞大；意识形态面临“终结”，社会理想处于困顿状态；体制性认同致使家庭伦理保守，男女社会角色相对固定。

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现在大量的新产品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合成纤维、冷冻食品、洗衣机、电冰箱提高着生活的质

量。同时，工业化高度发达，导致西方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生产性经济向服务性经济转变，丹尼尔·贝尔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转变的迹象，于50年代末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服务业不仅包括零售商店、洗衣店、银行业、金融业、

房地产、运输、通讯等，最重要是它包括教育与管理。

随着计算机等智能技术的运用，科学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直接的作用，技术知识分子被整合到经济体系中，社会结构按照科技治国的模式确立。由于服务业的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蓝领岗位开始下降，白领职业占据上风，中产阶级人数日益庞大。西方社会的这种太平盛世景象和科技治国模式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巨大挑

警察成为造反学生的斥责对象，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宣泄着强烈的反体制情绪。



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暴乱，国民自卫队在暴乱后的街区巡逻。



战，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共产主义理想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请参见本书第二章）。正像贝尔所说的，在西方，在知识分子中间，旧的热情已经耗尽，西方政治已经抛弃了过去那种启示录般的、千年幸福的幻想，旧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7]

50年代社会的整体化态势还表现为男女社会角色比较稳定，妇女认同传统的家庭伦理。美国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丹·贝蒂(Friedan Betty)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平稳的、整体化的社会生活中，已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首先，生活的富裕使很多低层百姓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大学。随布衣子弟一同进入大学的是底层文化的趣味和取向，平民文化或下层文化与主流文化产生某种融合，这动摇了壁垒森严的等级制传统，阶级界限日益淡化，从一种稳固状态变成一种流动性的社会因素，从而为60年代的文化大



众化提供社会基础。其次，由于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文化产品日益商品化、大众化，在客观上冲击了传统的文化检查制度。所有这些都为60年代反体制的青年运动和文化的标新立异提供了准备。

在西方，60年代的反体制运动遍地开花。60年代中期，美国不宣而战，发动越南战争，此举遭到美国举国上下的一致抗议，人们进行示威、守夜、警戒和非暴力反抗，其中，美国青年学生尤为活跃。他们的抗议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国家的青年学生运动。从1967年11月到1969年岁末，欧洲国家的青年学生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最为典型，成为60年代青年革命的代名词。

1967年11月，上万名法国学生举行为期十天的罢课，对法国的富歇教育改革方案提出质疑；1968年1月发生“游泳池事件”，学生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学生领袖柯恩－本迪特(Cohn-Bendit)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3月22日他率领示威者

美国的侵越战争成为青年革命的导火索。

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全面革命。

进入巴黎大学南特分校的会议室，并准备29日举行宣讲会。针对学生的抗议活动，校方数次宣布关闭校园。由于参与“3.22运动”的成员被责令面见大学纪律委员会，加之南特校园关闭，导致5月3日索邦发生示威活动。由于巴黎大学校长擅自请求警方进入索邦，驱散学生，导致矛盾冲突白热化。5月10、11日，三万学生游行示威，5月13日得到法国工会的支持，进行24小时总罢工。总罢工之后便是持续不断的游行和占领行动。从厂矿机关到学校、剧院，占领和革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德国的学生运动也同样如火如荼。集会、抗议、论辩此起彼伏，学生组织与法兰克福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进行对话，展开思想交锋。^[8]



学生运动一方面抗议美国的侵越战争，另一方面将矛头直指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他们要求在生活、学习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民主权利。贝尔曾对60年代的学生运动做如下分析：

60年代后期的学生造反，部分地反映了一种反文化的新力量，它反对出现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但从更大